



良渚文化研究丛书

张炳火 主编

遥远的村居

良渚文化的聚落和居住形态 王宁远 著

浙江摄影出版社

良渚文化研究丛书

张炳火 主编

遥远的村居

良渚文化的聚落和居住形态 王宁远 著

浙江摄影出版社



责任编辑：石英飞 林青松

装帧设计：薛蔚

责任校对：程翠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遥远的村居：良渚文化的聚落和居住形态 / 王宁远著.
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2007. 10
(良渚文化研究丛书)
ISBN 978-7-80686-578-1

I. 遥… II. 王… III. ①良渚文化—聚落环境—研究
②良渚文化—农村住宅—研究 IV. K871. 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6668 号

良渚文化研究丛书

遥远的村居——良渚文化的聚落和居住形态

王宁远 著

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浙江出版大厦 10 楼)

网址：www.photo.zjcb.com

经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制版：杭州美虹电脑设计有限公司

印刷：浙江新华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 × 1092 1/16

字数：168 千字

印张：13.25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80686-578-1

定价：38.00 元

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指导委员会

主 任：赵洪祝

副主任：夏宝龙 王国平 陈敏尔 巴音朝鲁

李 强 盛昌黎 张 曦

成 员：潘家玮 赵光君 马林云 沈立江

侯靖方 黄旭明 陈仲方 金兴盛

杨建新 俞剑明 陈永昊 万 斌

郑仓元 侯玉琪 徐 辉 胡祖光

许 江 王建满 王永昌 黄坤明

孙文友 徐止平 厉志海 张家盟

蔡 奇 楼阳生



王宁远

1968年生，浙江遂昌人。1990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现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长期从事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曾主持海盐仙坛庙、桐乡姚家山、安吉芝里等大型遗址的发掘，发表相关学术论文近20万字。

总 序

年近“耳顺”，不免时时回想过去，近五年来直接从事良渚遗址保护的酸甜苦辣，以及过去二十多年间亲身经历、体验和参与良渚遗址保护的点点滴滴，都如昨日之事历历在目，而将这些琐屑零碎的如烟往事俯拾起来，竟然就拼缀出良渚遗址保护岁月蹉跎的依稀景象。

1936年12月至次年3月间，施昕更先生三次代表西湖博物馆（现浙江省博物馆），对棋盘坟、横圩里、茅庵前等六处遗址小规模试掘，揭开了良渚遗址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序幕。上世纪50年代，随着长坟、邱城、水田畈、钱山漾等一系列遗址的考古发掘，以良渚遗址为代表的杭州湾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学文化的独特内涵和土著特性日渐显现，受到了一些考古学家特别的关注，1959年，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所长的夏鼐先生正式提出“良渚文化”的命名。1956年即已被浙江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第一批一等文物保护单位的良渚遗址，作为良渚文化的命名地，1961年被浙江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然而，随后的二十年间，作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良渚遗址，实际上并没有获得多少与之身份相符的有意识、有法规依据的长效保护，尤其是在1963年苏家村遗址的小规模考古发掘之后，良渚遗址的发掘与保护，随着浙江省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的全面停顿，也进入了一段长达十七年的真空期。此时反衬文物工作惨淡的，则是“农业学大寨”口号下全民动员改造河山的狂躁，以及农田水利建设与东苕溪堤塘维修加固等现实需要下的频繁动土，于是，许多高出地面的台墩型遗址首当其冲地成为挖取土方的对象，遭受破坏，良渚、瓶窑、安溪、长命一带固有的地形地貌和良渚遗址的景观都因此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虽然省、市、县文博部门的有关人员，当时也曾对动土中出土文物的相关地点作了现场踏勘与调查，并征集了为数不少的出土文物，但终因种种限制，未能实施进一步的抢救性考古发掘或保护措施。如今回想那段岁月，扼腕之余唯一能够让人感到些许欣慰的，是当时也有一些热心

的文物保护工作者，穿梭于田野村庄，从事着文物的收缴和遗址的管理，不少农民在动土中发现的文物，也能自觉上交省市文博管理部门，从而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良渚遗址考古发现井喷期的到来，提供了诸多极具价值的线索。

1981年吴家埠遗址的发掘，结束了良渚遗址长达十七年的考古真空期，接踵而至的则是一系列震惊中外的考古大发现。1986年反山墓地、1987年瑶山祭坛与墓地、1991年汇观山祭坛与墓地、1993年莫角山大型建筑基址，这些均被评为当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考古发掘，彻底颠覆了人们先前对于良渚遗址规模、范围和地位的认识。反山墓地发掘后不久，王明达先生即提出了“良渚遗址群”的概念，将浙江余杭县良渚、瓶窑、安溪、长命两镇两乡以及德清县三合乡三四十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四五十处遗址点，视为良渚文化相互关联的遗址群落和“占有相当重要地位的部族聚居中心”。紧接着，瑶山、汇观山、莫角山等遗址考古发掘所揭示的内涵，更奠定了“良渚遗址群”在良渚文化中最高层次中心聚落的地位。上世纪90年代后期，又经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工作站的系统调查与钻探，“良渚遗址群”范围内包括墓地、祭坛、大型建筑基址、大型防护性工程、村落、制玉作坊等各类遗址点的数量，由原先已知的50余处激增到135处，这些遗址点在布局上已初步显露出一个庞大而完整的、带有早期“都邑”性质的空间形态。以此为基础，对“良渚遗址群”的认识，此时也实现了由点到面的突破，人们不再将其仅仅视为一处由一百多个遗址点组成的“遗址群落”，而把它看做一个精心规划、有着明确功能分区的统一整体。“良渚遗址”，这个由施昕更最先提出、一度被“良渚遗址群”所替代的旧名称，重新回归，成为对这一良渚文化最高层次中心大遗址的专门称谓。1994年，良渚遗址因其在中华文明起源阶段无与伦比的重要价值和保存的完整性，被国家文物局列入中国申报《世界遗产名录》的预备清单，国家文物局专家评价说，良渚遗址重大价值的不断揭示，已经改变了以往人们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时间、方式、途径等重大问题的认识；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

随着价值的不断提升，对良渚遗址的管理和保护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就在

良渚遗址因一次次重大考古新发现而风光无限之际，省、市、县各级政府及各级文物管理部门，却一次次地体会着遗址保护的艰辛和困难。改革开放以来，地处杭州市近郊的区位优势，使得良渚遗址所在的良渚、瓶窑两镇和安溪、长命两乡，迅速加入了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集镇规模急速膨胀，乡镇企业快速发展，给遗址保护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前后兴盛起来的石矿开采业，在致富一方的同时却造成了遗址大环境的持续恶化，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良渚遗址北侧天目山余脉大遮山丘陵地带有同时开采的大小石矿30多家，每家年产量从几十万吨到数百万吨不等，使得这一片自古以来适宜人居的良善秀丽之地，每日笼罩在隆隆的炮声和弥漫的粉尘之中，山不见翠，满目疮痍。在遗址大环境持续恶化的同时，遗址本体也面临着严重威胁，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良渚文化玉器黑市价格的不断走高，盗挖良渚遗址、倒卖良渚文化文物的现象一度猖獗，根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工作站上世纪90年代晚期的调查资料，良渚遗址135处遗址点中，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遭盗掘、留下盗洞的至少有25处。

因此，如何在各种利益、各方力量的博弈中，建立起长效有力的管理体制和保护体系，强化良渚遗址的日常管理和保护。如何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与遗址保护的矛盾，最大限度地减轻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对良渚遗址本体及其周边环境的破坏。如何依法坚决打击盗挖盗卖的犯罪行为。构成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良渚遗址保护不懈努力的核心内容。1987年，余杭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反山遗址一侧设立了良渚文化遗址管理所，专司良渚遗址日常巡查和管理，使遗址保护有了常设的机构和专门的人员。1990年，余杭县人民政府颁布《关于确定良渚文化遗址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的通知》，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要求对良渚遗址实施管理。1993年，浙江省文物局委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良渚工作站，参与良渚遗址的日常管理和保护，并全面负责遗址保护范围内的考古发掘与调查工作。1995年，浙江省人民政府以浙政发[1995]133号文件的形式，批准公布《良渚遗址群保护规划》，明确了总面积为33.8平方公里的良渚遗址保护区范围，并在保护区范围内划定了重点

保护区、一般保护区与建设控制地带，要求严格控制遗址保护区内的各类建设行为，良渚遗址保护自此走上了依规划管理的道路。同年5月3日，浙江省还成立了由分管副省长任组长的良渚遗址群保护领导小组，从宏观上指导和协调良渚遗址的保护、规划、管理、发掘、研究和利用等重大问题。1996年，良渚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9年，国家文物局就加强良渚遗址保护工作专门致函浙江省人民政府，指出“良渚遗址是我国和人类的罕见的珍贵历史遗产，具有突出的重要性”。并提出了扩大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建立考古遗址景观及生态保护区或国家遗址公园、加强组织领导和投入、另辟新区发展现代化的城镇和工业、抓紧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前期准备、组织多学科的力量投入工作等多项建议。

这种各级各部门对良渚遗址保护的高度重视，在90年代末终于转化为一系列扭转局面的强有力措施。1996年11月，建在莫角山遗址上的长命印刷厂完成外迁，成为我省首家因为保护需要而搬离重点遗址的企业；1999年2月，绕开遗址区的104国道南移改道工程正式竣工通车，据测算，新建绕道工程比原路拓宽要多投入了1亿多元，各级政府保护良渚遗址的巨大决心，由此可见一斑；1999年6月，余杭市开展了打击文物犯罪的专项行动，一举抓获盗掘良渚遗址、贩卖良渚文物的犯罪嫌疑人53名，其中35名在庭审中被绳之以法，为首者被判刑期长达12年零6个月，自此以后，针对良渚遗址的盗挖活动基本杜绝；2000年7月，浙江省人民政府决定下决心关闭石矿以切实整治良渚遗址的环境风貌，10月，随着瑶山遗址周边6家石矿的关闭，分期分批关停石矿也走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不过，良渚遗址的保护，毕竟不可能毕其功于几次强有力的整治行动。二十一世纪之初，在浙江省、杭州市与余杭区三级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良渚遗址保护在建立长效机制和体制方面又掀开了新的篇章。2001年9月，在杭州市和余杭区的动议下，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范围为扩并后的良渚、瓶窑两镇，区域面积242平方公里，成立正区级的遗址保护专门机构，一体规划和管理遗址管理区内的文物保护与社会发展，实施以外围适度开发促进遗址真正

保护的总体思路，这种大遗址保护与管理模式上的创新，走在了全国前列，充分体现出省、市、区各级政府和部门对良渚遗址保护工作的高度重视，其多年的实践已成为国家文物局向全国推广的大遗址保护的重要经验。

2003年1月，当我调任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主任之时，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代表杭州市、余杭区两级党委政府，对良渚遗址管理区实施的文物保护、城乡规划、经济开发、社会管理等诸方面的工作已卓有成效。2001年12月，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杭州市良渚遗址保护管理条例》，使良渚遗址保护首次有了专门的针对性法规；2002年9月，浙江省政府成立了浙江省良渚遗址保护专家咨询委员会，聘请张忠培、严文明等12位著名考古、规划方面的专家为咨询委员；2002年10月底，随着遗址区附近最后一家石矿的关停，遗址保护区内终于初步恢复了青山绿水的清雅灵秀环境；由国家文物局指定，余杭区政府委托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编制的《良渚遗址保护总体规划》，虽然在建设控制地带的面积大小问题上，各方出现了明显的意见分歧，但就保护区42.04平方公里的范围已达成了共识；良渚、瓶窑两镇也进一步明确了“跳出遗址保护区求发展”的规划蓝图。而我履任近五年来，也庶竭驽钝，与遗址管理区管委会的全体同仁一起，就如何保证遗址本体的长治久安、如何营造与遗址保护要求相协调的优美环境、如何营造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和谐关系、如何在整体保护前提下合理展示和利用遗址等问题，展开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譬如我们本着积小胜为大胜的信念，启动了莫角山、反山、塘山等重点遗址的环境整治工作，已从遗址本体上搬走了10余家小型加工企业，初步改善了重点遗址的环境风貌。又譬如为有效控制违章建筑，解决遗址保护中的执法依据和执法力量的问题，我们积极争取杭州市人大与余杭区政府的支持，建立了杭州市园文监察支队良渚遗址文物行政执法大队，在遗址保护中逐渐形成了文物管理、城管执法、国土管理、公安等多部门共同参与、各司其职的联合执法体制。所以，当2006年，良渚遗址在经过了突出的普遍价值、世界遗产的标准符合、价值的对比分析、保护管理现状等方面的重新评估之后，再次被国家文物

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我并不觉得意外，但一想到列入《预备名单》，并不意味着良渚遗址的保护管理已取得了决定性的成果，反倒标志着一个更高要求、更高标准的新的保护管理阶段的开始，就没有如释重负的轻松感觉，毕竟，良渚遗址目前的保护工作，离遗址与环境和谐共秀、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和谐共处、遗址整体保护与合理利用相得益彰的境界，尚有不小的差距，前路漫漫，任重而道远。令人兴奋的是，就在最近，良渚遗址又迎来了石破天惊的重大考古新发现，在莫角山遗址四周发现了良渚文化时期完整的古城墙基址，一座五千年前的良渚古城已初露端倪，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称之为“中华第一城”，严文明先生欣然提笔，写下“良渚古城，文明圣地”的题词，无疑这也会让良渚遗址申遗加上重重的砝码。

目前，良渚遗址保护的诸种矛盾之中，最为突出的，显然是保护区内现有3.6万城乡居民和170余家企事业单位的生活、生产和发展需要，与遗址保护所需的空间之争。多年来良渚遗址保护的教训已明确告知我们，保护良渚遗址这样面积达42平方公里、与数万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超大遗址，若离开了当地广大干部群众的理解、支持和参与，光靠文物管理部门孤军奋战，其成功的几率无疑是零，因此，最大可能地取得保护区内民众对保护工作的理解、支持、参与，争取广大民众由“要我保护”的被动受体转变成“我要保护”的主观能动力量，并努力争取全余杭、全杭州、全浙江乃至全中国广大民众的理解、支持和参与，已成为决定良渚遗址保护最终能否取得成效和能取得多大成效的关键性因素，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除了在立足保护的基础上，切实解决保护区内民众发展生产和生活需要的切身利益之外，开展多形式、多层次、多媒介、多角度的宣传活动，将是必不可少的途径。所以，当蒋卫东同志向我建议，由我们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组织省内外有关专家，撰写出版《良渚文化研究丛书》，我便觉得此举将在良渚文化专业学者和普通读者间架设一座通古达今的桥梁，使得对良渚文化和良渚遗址感兴趣的非专业读者也能登堂入室，可以较系统、全面地了解良渚文化和良渚遗址研究的现状、良渚文化物质社会与精神世界的基本内涵以及良渚文化和良渚遗址在“多源一体”中华文明起源

中的突出地位，是一桩有利于良渚遗址保护的好事。在与相关同志商量后，大家一致认为良渚文化和良渚遗址的学术研究是良渚遗址保护的基础，所以不仅赞成出版《丛书》的建议，而且还希望将《丛书》变成一个逐年推出成果和新著的系列项目。为此，《丛书》还申报了“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系列项目”，获得立项。

良渚文化七十年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成果显示，良渚文化的独特性表现在聚落形态、宗族构成、社会生活、宗教观念、礼仪制度、艺术情趣等考古学文化的方方面面，而导致这种文化独特性的原因又牵涉到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经济类型、生产方式等方方面面，因此，《良渚文化研究丛书》的基本思路，是以考古发现和出土的大量信息资料为素材，挑选和邀请在良渚文化研究各个不同领域内卓有成绩的中青年专家，就各自擅长的专题进行较深入的研究，然后撰写出版相关专著，旨在通过对良渚文化物质环境 and 精神世界诸多方面子课题的系列研究，由点到面，构筑起对良渚文化全面和纵深研究的较完整体系，深化对良渚文化和良渚遗址的总体认识，而这无疑是一项内容丰富而庞杂的系统工程，短期内难以全面铺开实施，选择一些容易引起普通读者共鸣的课题，作为《丛书》第一辑的选题，无疑是非常明智和切实可行的。

经综合考虑，《丛书》第一辑选择的五本专著，分别是蒋卫东研究员的《神圣与精致——良渚文化玉器研究》、赵晔研究员的《湮灭的古国故都——良渚遗址概论》、刘斌研究员的《神巫的世界——良渚文化综论》、俞为洁研究员的《饭稻衣麻——良渚人的衣食文化》和王宁远副研究员的《遥远的村居——良渚文化的聚落和居住形态》。这五本专著的作者都是长期从事田野考古发掘和研究的一线人员，虽然研究的领域不同，治学的风格各异，但都已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令人称道的成绩，他（她）们已发表的论著，不仅有严肃的探索，而且还充满着深厚的学术素养和学者的睿智，与此同时，他（她）们还掌握着大量良渚文化和良渚遗址考古的第一手资料和信息，其中有些资料和信息足以颠覆我们对良渚文化和良渚遗址业已形成的一些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而他（她）们也很好地利用了这种优势，以全新的角度和合

理的诠释，赋予断简残片式的考古资料和信息以全新的生命力，部分复活和建构起四五千年前良渚文化人与人之间、人与遗迹之间、人与器物之间、人与事件之间相生相伴的场景和细节，这使得每一部著作，都不仅仅是良渚文化考古资料的堆砌，不仅仅是象牙塔内的孤芳自赏，而是一种理性思考和学术严谨、细节把握和文字活泼的复合体，一番“意新而文美”的创作追求，是一坛坛奉献给广大读者的醅醅春醪。

当然，毋庸回避，我们主持编辑的这套丛书，难免因工作的疏忽和研究的偏差而存有一些令人遗憾的纰漏错讹，对于这些不足之处，我们渴望得到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以便我们在今后的编辑过程中加以改进。

张炳火

2007年10月于临平

目 录

前言 良渚文化居住形态研究的目的与现状 /1

第一章 良渚文化聚落的宏观考察 /6

第一节 研究方法与思路 /6

第二节 遗址地貌类型与时空分布 /8

第三节 聚落规模与等级 /13

第二章 环境、气候变迁及经济模式与良渚聚落形态 /18

第一节 太湖流域现代环境 /20

第二节 5500a.B.P 前的环境、人类经济与居住形态 /21

第三节 5500a.B.P 后的环境、人类经济与居住形态 /26

第四节 聚落的扩散与人口迁移 /31

第五节 良渚中晚期环境变化与人地关系矛盾 /35

第三章 基层聚落个案分析 /38

第一节 嘉兴地区 /39

一、仙坛庙 /40

二、普安桥 /64

三、新地里 /72

四、嘉兴地区台墩遗址再认识 /79

第二节 良渚遗址群 /98

目 录

- 一、庙前及周边 /98
- 二、三亩里及后头山 /115
- 三、卞家山 /118
- 四、水田畈 /122
- 第三节 苏南—沪西地区 /123
 - 一、龙南 /124
 - 二、绰墩 /139
 - 三、少卿山 /154
 - 四、黄土山 /156
 - 五、独墅湖 /158
 - 六、马桥 /160
- 第四节 湖州地区 /162
 - 一、毘山 /162
 - 二、塔地 /169
- 第五节 武进—江阴地区 /170
 - 徐家湾 /170
- 第六节 小结：共性与差异 /172

第四章 干栏式建筑与仙坛庙建筑图案 /178

附录 与建筑相关的民俗调查 /194

后记 /200

前言

良渚文化居住形态研究的目的与现状

史前考古的中心任务在于通过揭示和研究各类物质遗存来重建史前史。良渚文化是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考古学文化，因其在中华文明起源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而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自1936年施昕更对良渚遗址的发掘以来，迄今发现的良渚文化遗址地点已达数百处，其中经过发掘或试掘的地点数量，在江浙地区史前考古工作中亦遥遥领先。但是，这些考古工作提供的信息，离我们恢复良渚社会真实面貌的要求还相距甚远。

首先，有关良渚文化的考古资料在遗存类别上存在显著的不平衡性：墓葬资料极其丰富，涵盖各个分布地区，不同时期、不同等级的墓地持续发现，墓葬数量动辄几十上百座，在此基础上，与良渚墓葬相关的各类研究也颇为深入。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相应的居址材料数量却是寥寥可数的个位数，与墓地数量完全不成比例。同时因发掘面积等限制，这些居址材料常常显得支离破碎，不成系统。因为良渚文化墓地多以高出地面的土墩形态出现，在太湖流域的平原地区，这些土墩往往是各类基本建设的施工对象，所以近年来随着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的基本建设热潮，许多土墩被推平，新的考古发现很多。在以配合基本建设、进行抢救性发掘为考古工作主要任务的现实情况下，近期内这种发现的不平衡只会进一步加剧。考古材料的类型偏颇，明显影响了良渚文化基础性研究的深入，使聚落研究陷入只能依靠墓葬材料来进行推演的尴尬境地，成为良渚文化研究中的一大瓶颈。墓葬材料固然也可以反映社会某些层面的内容，但毕竟是一种镜像式的间接投影。居址材料的缺乏使我们对当时社会现实生活情形所知甚少，后续研究只能停留在框架式的趋势研究上，粗泛而不成体系。

造成这种不平衡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1. 南方地区潮湿的堆积环境，大

大增加了田野工作中对居住面等迹象的辨识难度,容易对各遗迹单元间相互关系的理解造成偏差。2.良渚文化主要分布于太湖流域的碟形洼地,自崧泽晚期这种地貌形成后,此区的人类居住模式一直变化不大,即村落一般都建于台墩等高地上。太湖流域历史时期一直是人口密度极高的区域,长期的居住行为与农桑活动集中于这些台墩高地上,对早期居住遗存的破坏相当大。3.良渚文化居址和墓葬两类遗存数量上的差距,常被认为是考古发现的偶然性造成的。但是,发掘点的总量如此之大而两类遗存数量如此悬殊的现象,使我们不得不从认识论的角度进行反思:可能某些思维定式误导了考古迹象的判读,使我们发现了居址类遗存而无法认识。

面对这种局面,许多有识之士发出呼吁,要求重视良渚文化聚落遗址的发掘与研究。^[1] 相对于墓葬发掘,居址类遗存发掘的田野操作难度高,工作周期长,人力物力的投入大,而产生的所谓“社会反响”要小很多。幸而仍有许多一线的考古工作者在浮躁的氛围里,能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克服种种困难,常年从事寂寞而艰苦的居址类遗存发掘工作,为我们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良渚文化居址材料。

迄今所有关于良渚文化居址材料全部来自考古发掘。主要地点有以下几处:

余杭良渚遗址群及周边:庙前、莫角山、卞家山、姚家墩、余杭三亩里、杭州水田畝;

湖州地区: 昆山、塔地、钱山漾;

嘉兴地区: 普安桥、仙坛庙;

苏州地区: 龙南、绰墩、少卿山、黄土山;

上海地区: 马桥;

江阴附近: 徐家湾。

其中庙前、良渚遗址群、昆山、马桥已发表专题报告,绰墩、龙南、少卿山、莫角山、普安桥、钱山漾、徐家湾、水田畝已发表简报,其他地点则只在《考古学年

[1] 石兴邦:《良渚文化的过去、现状和展望》,《良渚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1999年;秦岭:《良渚文化的研究现状及相关问题》,《考古学研究(四)》,科学出版社,2000年。